

“误读”现象的认知探析

尹一兵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长沙 410081)

摘要:文本的唯一性和读者的多样性决定了误读是不可避免的。多元解读与误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过度阐释将会使多元解读演变成误读。误读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在防止“曲读”的同时,应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并尽量做到尊重文本,尊重作者意图。

关键词:误读;文本;解读;主体性

随着现代阐释学对读者主体性的解放,“误读”这一文本阅读现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关注。对此,笔者结合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以及现代阐释学对其进行浅要的论述。

一 误读产生的根源

根据接受美学的理论,任何文本都存在不确定性和空白,文本一旦和读者发生关系成为审美对象,它就不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而是成为读者感悟、阐释后形成的情感和形象。又因读者“期待视野”的存在,“读者之于作品,必然会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成分,即阐释学理论所指出的‘前理解’。^{[1]300}这种“前理解”与作者的意图、作品的意蕴及其艺术价值产生冲突便产生了“误读”。既然我们存在对文本的“误读”,那么有没有童庆炳先生所提出的与“误读”相对的“正解”呢?即与作者的意图,作品的意蕴及其艺术价值相吻合的文本解读呢?我们认为,理想中的纯粹的“正解”是不存在的,而且“正解”也不应该理解为唯一的、完全正确的解释,而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接近原解。这可以用伊瑟尔的理想读者来说明:“就文学交流而言,在文本结构上构建一个理想的读者是不可能的。理想的读者必须和作者拥有完全相同的代码。然而,作者一般要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在文本中重新编码,那么理想读者也必须分享潜在于这一过程中的作者意图。如果这种可能性存在的话,那么交流便是多余的,因为只有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没有分享的东西才需要交流。^{[2]236}现象学大师英伽登也曾提出“每一次新的

阅读都会产生一种全新的作品”。由此说来,“一切阅读者都是误读”便有了理论依据。其实在我国古代文论中对文本误读也有所认识,清朝周济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就说:“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智者见知。^{[3]1630}同时代的谭献在《复堂词录序》中说:“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3]3987}袁枚在《程绵庄诗说序》中也说:“作诗者以诗传,说诗者以说传,传者传其说之是,而不必尽合于作者也。”^{[4]2}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由上可见,无论中外,误读的现象都是普遍存在的。但是误读毕竟不是“正解”,从它的发生来看,它是不可避免的;从读者认知的角度看,它又给读者在学习新的知识的时候制造了障碍。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将“误读”与“多元解读”区别开来。

二 误读与多元解读

什么是多元解读呢?“所谓多元解读,就是不同的人或同一个人身处不同阶段时,对同一文学作品所引发的生活感悟不同,所产生的心灵震撼不同,所引起的联想、启迪不同,所建构的知识不同。由于解读文本的视角不同,使用解读方法不同,解读的结论自然不同,它可以是批评性解读,可以是背离性解读,也可以是分歧性解读,所以,在发表自己的见解时,要尊重他人的声音,尊重他人的话语权。^[5]由上我们可以隐隐看到它与误读的相似性,那么多元解读与误读是否是同一个概念呢?当然不是。我们认为,多元解读应该是属于广义的误读(在这里,我们将没有达到“理想读者”的解读都称为误读),但

收稿日期:2008-11-05

作者简介:尹一兵,男,湖南衡阳人,湖南师范大学文艺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古代文论。

是这种阅读是具有积极性的。因为读者仅仅是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到了文本的一部分内涵,不可能将文本完全消费,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鲁迅先生也说,在看《红楼梦》时,“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由此可见,多元解读实际上是一种非完全解读,本质上不是“误读”。^[6]

这里之所以要提到多元解读,是为了将其与狭义的“误读”相区别。“狭义的误读,是指读者对作品所作出的解读脱离了文本的规定与限制,从而做出的是背离、曲解文本意义的解读。这种误读的结果往往是片面的、不确切的,节外生枝的,甚至是错误的、荒谬的。”^[7]这种狭义的误读显然是一种主观动机不纯的曲读。由这二者之间的定义我们可以知道,“广义的误读”(多元解读)是无意识的,不完整的解读,在这里接受者是以一种认真的态度在解读文本,不曾意识到这是不符文本意识的。而“狭义的误读”(曲读)是有意识的,背离的、歪曲的解读,在这里接受者是知道文本意思的,但是为了某种目的故意将文意歪曲。例如,清初文字狱时,统治者就曲读“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等诗句,对诗人们进行政治迫害。其实“曲读”也有其理论依据,克里斯蒂娃就认为文本就是一个不断生成的场,文本的意义在不断的延伸,文本的意义一直处于不断滑动当中,它一直在无限的运动。因此,文本的意义是不会固定的,我们无法获知文本的意义。在克里斯蒂娃的文本理论中,文本意义的开放性被夸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因此也就产生了下面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

三 误读的底线

多元解读与误读的底线之间有没有联系呢?答案是肯定的。前面已经说过,多元解读是一种广义的“误读”,多元解读是不是就意味着文本的解读真地可以信马由缰、天马行空呢?我们认为,对文本的解读还是有底线的。多元解读也不例外,因为它与狭义的“误读”之间的区别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对文本进行“过度”的阐释,往往就会使本来的多元解读变成狭义的“误读”。伊瑟尔认为文本中存在有一个隐含读者。“隐含读者这一概念是一种文本结构,不界定一个接受者,但预示着他的出现:这个概念为每个接受者或竭力排除接受者,这个预先构筑的角色仍然存在。所以,隐含的读者这一概念指

的就是一张激发结构网络,它推动读者去把握文本。”^{[2][238]}由此可见,文本由作者创作之初就被赋予了意义,作品制约着接受活动,使解读不至于脱离文本的意向,对文本做出随意的理解。

随着克里斯蒂娃的文本理论逐渐被人们所熟悉,它的缺陷也逐渐暴露出来。置文本语境及作者意图于不顾,便否定了文本存在的意义,那么读者阅读文字与否都无关紧要了。

所以说我们对文本的解读应该遵循一定的原则,即误读的底线。虽然我们不能还原文本的所有内涵,但是我们可以尽可能的接近。我们该如何接近呢?首先,我们应该尊重文本,尊重文本语境。文本语境包括四方面,“一是语体语境。二是文本语言内部相辅相成、相互关联的字、词、句、段落、篇章之间的意义联系,也就是我们可以感知的上、下文语境。此外,文本诞生于一定的时代背景,文本中的话语受社会习俗和文化传统的支配和规范,打上了一个民族语言运用习惯和思维品质的烙印,因而文本语境还包括渗透于字里行间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即社会语境。文本语境的第四个方面是作家语境,主要是指作者的写作意图、社会阅历、文化修养、思想倾向、审美情趣等内在因素。”^[8]这段话对文本的结构做出了十分细致的分类,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文本其实包括如此丰富多彩的内容。可是现在我们的文学批评活动中,我们往往忽略了文本的首要作用,不注意文本细读的重要性,脱离第一文本直接去阅读第二文本,做出的批评往往是批评中批评,过度阐释的现象也十分地普遍。重新回归文本已经刻不容缓。其次,我们应该正确地对待自己的“前理解”,因为过分依赖自己的前理解容易产生上面所说的狭义的“误读”。《庄子·人间世》说:“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9]意思就是说用耳朵和心去吸取知识都有所局限,因为耳朵受所听到的东西所迷惑,而心有意追求与物相符合,都不是“虚而待物”的状态。只有“听之以气”才是学习的最佳状态,因为“气”无端,即虚也,唯有虚心,才是真道。所以要达到“心斋”的境界,即“虚以待物”的状态。可见庄子对接受者在接受前的内在储备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每个读者都有自己的个人阅历、知识系统、性格爱好、文化习惯等等,而文本也是一个客观存在,读者与文本之间的相互了解就是读者的期待视野与文本语境的偏离或吻合问题。于是,有些

读者就按自己的喜好去欣赏作品。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说：“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篇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蕴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已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持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10]所以解读文本的关键在于读者对文本语境的调适与聆听。怎样做到这一点呢？首先，要做到尊重文本，尊重文本语境；其次，按庄子所说要达到“心斋”、“坐忘”的境界；同时，还要扩大自己的个人阅历，知识储备。因为“如果将读者语境和文本语境分别比作两个圆的话，那么它们的交集越多，读者对文本的把握就越全面，越深刻。”^[8]

四 误读的意义

在传统解释学阅读中，人们认为文本存在“原义”，人们阅读的过程就是寻找文本原义的过程。这种认识论在中国有庄子，在西方有培根作为代表人物。他们把读者看作阅读主体，把文本看作阅读客体。主体在阅读时往往带有先见，客体本身也有其内在结构。既然人们阅读时是为了获得文本原义，那么人们在阅读时就应该摒除先见，全身心接受或捕捉文本原义。这便是庄子所提出的“心斋”、“坐忘”。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文本是高高在上的，接受者只有委屈自己去迎合文本，文本享有着至高无上的霸权。

现代哲学解释学的代表人物海德格尔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我们之所以能够理解，恰恰是因为我们存在先见。也就是说任何阅读都是在先见影响下的阅读。而在摒除先见去阅读的传统理论中，主、客体本末倒置，客体（文本）掌握了话语霸权。正是在海德格尔理论的影响下，人的先见具有了合法性。在这个时候人的主体性便被突现出来了。因为人的先见往往不同，因而面对同一文本而产生不同的解释便顺理成章。在这里，接受者和文本的地位是平等的，在理解的过程中是互动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后来，结构主义代表人物德里达对文本阅读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他认为文本意义是不确定的，文本意义就像那被等待的戈多，它存在，但它永远不出

场。文本在不断地被人们所阐释，但永远不能完全地获得它的意义。福柯在其后又提出了“断裂”阅读法。他尊重文本解读的差异性，反对同心圆似的阅读法，即反对文本中心思想的提法。同时也致力于文本的非连续性，认为文本的意义和写作都是非连续性的。这个观点深受尼采的影响。尼采曾说，我要将文字跳到句子之外，要让句子跳到段落之外，要让段落跳到文章之外。这样，读者的主体性就渐渐取得了话语权。

显然，我们谈到的文本误读与阐释学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从传统的阐释学到现代的阅读理论，作为读者的主体地位被逐渐凸现出来了。读者由被动接受变为主动吸收，由被支配而变成平等对话，甚至掌控了文本的话语权。这样有利于读者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实现自己个性化的文本理解和人生阅读。这些理论都从不同角度论证了“误读”的积极性，只是，我们在文本阅读过程中，同样也应该防止“曲读”现象的出现，防止“过度”阐释与“越文本”阐释，尽量做到尊重文本，尊重作者意图。

参考文献：

- [1] 童庆炳. 文学理论教程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 [2] 朱 刚.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3] 唐圭璋. 词话丛编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4] 赖力行.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学 [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 [5] 张秋玲. 莫把误读当多元 [J]. 语文建设, 2006(4).
- [6] 鲁 迅. 鲁迅全集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179.
- [7] 卢金明, 霍术东. 文本误读: 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 [J]. 现代语文(教学研究版), 2006(7).
- [8] 李 娟. 追求读者语境与文本语境的融合——辩证认识文本中的误读现象 [J]. 中学语文, 2006(1).
- [9] 郭庆藩. 庄子集释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147.
- [10] 詹 瑛. 《文心雕龙》义证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1847.

(责任编辑: 黄声波)